

社會學叢書

11

社會學理論 的歷史反思

張家銘／著



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社會學叢書 11

社會學理論的歷史反思

張家銘 著

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社會學理論的歷史反思／張家銘著．—初版．—
臺北市：洪葉文化，1998 [民 87]
面；公分．—（社會學叢書；11）
ISBN 957-8424-33-7 (平裝)

1.社會學－論文、講詞等
540.7

87011574

社會學叢書 11

社會學理論的歷史反思

作 者／張家銘
責任編輯／鄭淑娟
封面設計／劉嘉淵

發行人／薛慶意
發行所／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

地 址：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

電 話：(886 2) 2363-2866

傳 真：(886 2) 2363-2274

劃 撥：1838175-3 葉玉梅帳戶

門市部／電 話：(886-2) 2736-2544

排 版 所／辰皓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版 次／1998 年 10 月 初版一刷

I S B N / 957-8424-33-7

定價 220 元

◎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

新版序

多年前《社會學理論的歷史反思》曾經付梓，雖然年餘即已一版售罄，卻因為書籍性質與出版社不盡相合而絕版。近來感於教學上的需要，可以當作學生修習社會學理論的參考資料，加上洪葉出版社顧問歐崇敬先生的力邀，故決定加以整理，重新再版問世。

新版的《社會學理論的歷史反思》收錄了九篇論文，是個人多年來從事閱讀與寫作的部份心得，其中有六篇是舊版保留下來，另三篇是新加入的。論文集自然具有主題缺乏連貫與系統的特徵，惟作者的興趣集中於社會學家或學派的理論與社會發展理論兩方面，故全書各篇主題尚不致過於零散，還是有脈絡可尋。〈政治教育與政治成熟〉一文，可視為〈恢復理論原貌與啓發本土研究〉一文倡議的努力之一；〈理論、歷史與想像力〉一文反省的對象，正是〈理論化與形式動力〉一文主張者，而〈「世界經濟」與資本主義〉一文乃是前文的後繼作品，可以一起搭配閱讀，至於〈說明、詮釋與批判〉一文則可以針對相關議題申論或定位；〈理論深淵與歷史深度〉一文論述者，正是〈傳統與現代〉一文介紹的各派發展理論應用來解釋

台灣經驗的反省，而〈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與社會發展〉則是其中一派一家的看法，具有相輔相成之效。

這本集子的選編標準有二：一是與社會學理論相關者；另一是曾經在學術性刊物發表過的。根據第一個標準，全書冠以廣義的「社會學理論」。至於「歷史反省」(historical reflections)一詞則有兩層意義。第一層是屬於方法論上的，指涉理論所蘊含的歷史意含或深度。第二層意義則著力於西方理論與本土社會之間的關係上。其間或基於某種社會關懷去詮釋西方理論，藉以間接批判本土社會；或直接針對學圈的做法加以歸類和反省。

本書再度出版，必須特別感謝歐崇敬先生及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願意支持此類非暢銷的學術書籍，著實另人讚佩。此外，要致謝的人很多，包括師長、同事、好友、學生及家人等的鼓勵，無法一一列名，銘記在心就是。

最後，作者必須說明的是，本書僅代表個人研究的部份階段性成果，其中不當與不足之處在所難免，其責任除了由個人自負之外，尚祈先進同好不吝指正。

張家銘

一九九八年初秋于台北外雙溪

東吳大學社會學系

目 錄

政治教育與政治成熟	3
——韋伯的政治理論與實踐	
恢復理論原貌與啓發本土研究	33
——臺灣「韋伯熱」現象的深層思考	
理論、歷史與想像力	49
——布勞岱的歷史世界及其對社會學的反省意義	
「世界經濟」與資本主義	81
——論近代西方的形成	
理論化與形式動力	101
——實證社會學的理論結構	
說明、詮釋與批判	123
——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爭議	
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與社會發展	153
傳統與現代	175
——發展理論的回顧與反省	
理論深淵與歷史深度	201
——臺灣發展經驗的解釋及其反省	

政治教育與政治成熟 ——韋伯的政治理論與實踐

除了〈政治當爲一種天職〉(Politics as a vocation)一文是可能的例外，以往我們對韋伯的瞭解都一直局限在他的學術論著。如果不經批判地接受所謂「學識」(scholarship)與「黨性」(partisanship)間的普遍區分，我們將難以體會韋伯的政治關懷，因此也就無法掌握其社會學分析與政治作品間的關聯性^①。一八九五年佛萊堡大學的就職演說，他提出〈民族國家與國民經濟政策〉一文，便已經顯現他對當時政治情況的關注。此後，特別是第一次大戰期間及戰後，其政論性文章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，這些論文後來被集成所謂的《政治論文集》。這本論文集對韋伯本身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，因為裡面不但包括他對當時政治的主要理論性批判，同時是針對廣泛的德國民衆而發的。透過這些文章，我們不但能夠一窺韋氏思想中的基本政治特質，更可以釐清其政治立場。畢竟，「在許多方面，韋伯的生活與思想正是政治事件和關懷的體現」^②，「因為他是一個政治人，也是一個政治知識份子」^③。

本文並不企圖對韋伯的政治論文做廣泛性的探討，作者的焦點集中在他有關「政治教育」(political education)這

個論題上。韋氏的「政治教育」概念與現今政治學中「政治社會化」(political socialization)一辭的內涵有很大的歧異，因為這是針對德國政治的歷史背景及當時的特殊狀況所提出的主張。它的迫切需要，不但反映了民族生活危機的如何形成，更指出一條在現實環境限制下的可能出路。因此欲瞭解韋伯此一主張的真正內涵，從「價值中立」(value-free)的「純科學家」(pure scientist)立場出發是無濟於事的，惟有關聯到德國當時的政治情境及韋伯的政治關懷，才得以忠實的掌握。

那麼，扣緊德國的歷史脈絡而言，韋伯提出政治教育主張的背景因素是什麼？政治教育的目標何在？其內容又為何？還有，政治教育的目標又該如何實行？本文的旨趣在於：透過上述問題的提出與回答，藉以說明韋伯的政治理論與實踐間的關聯，以便掌握其社會學的倫理立場。

俾斯麥遺產

如果把韋伯的作品視為一整體，他有關政治教育的觀念雖然經常出現在後期的文章裡，但早在佛萊堡大學的就職演說中，他便已顯露此一看法。為何韋伯始終堅持這樣的主張，並且對它的需求愈來愈迫切？從歷史上而言，這個反應必須在俾斯麥(Bismarck)的政治體現及其留下的遺產中尋求。

韋伯對俾斯麥的成就抱持一種愛憎交加的態度，這正是他政治作品的總根源^①。對於俾氏有關統一德國及使其成

爲強權的努力與表現，韋伯承認並羨慕他的政治天才。但他並沒有將俾氏加以英雄化，因爲他的角色令他不敢毫無批判地降服於俾斯麥。韋伯曾解釋自己的立場說道：「政治家必須妥協；那是他的工作。但是我的天職是屬於學者型的，……學者不能妥協，或者讓『無意義的事』保持隱晦^⑤。」

基於上述的信念，韋伯提出對俾斯麥的基本批判：無法見容具有獨立心靈的政治領袖，卻在身伴培養一大群溫順且服從的科僚人員^⑥。其後果具體表現在具有龐大科層組織的帝制獨裁政權，政黨和議會的權力衰微，以及國民普遍缺乏政治教育機會與政治成熟度。

俾斯麥不但成功地控制了龐大的科層組織，讓所有科僚人員唯命是從；同時更創造了無比的魅力，成爲當時及後世人人崇拜和模倣的聖人。「至今很長一段時間，這種控制的態度不但形塑了保守政客，同時也形塑了狂熱的知識份子，甚至是一般大眾的歷史神秘主義，他們藉由模倣俾斯麥的形象，企圖將自己融入俾氏的精神裡」^⑦。即便是議會及政黨的領導者也不例外，他們完全無能去抗衡俾斯麥的優越感。韋伯的見證指出：「我一再從他們的領導者中聽說，假如有一個新的俾斯麥，他們將認定帝政主義——由一天才所控制的政府——是德國最佳的政治體制」^⑧。俾斯麥不但是聖人，同時也是國家的形象。聖人與國家合而爲一，成爲「德國的」國家理念。

以基督新教的派別爲比較媒介，韋伯認爲所謂「德國的」國家觀，係與路德派信仰結合的結果。神秘主義的路

德派教派認為神賦予政府無上的國家權力，人民應該虔誠地服從它。由此自然產生官府具有超個人的神聖權威，官職也帶有魔咒的性格，人民必須表示恭順之意。這些都成為俾斯麥的遺產之一——科層統治的思想基盤。是故路德教派的信仰乃建基於「完全情緒作用的國家形上學」和「順從關係」上^⑨。

反之，禁慾的喀爾文教派拒絕把一切被創物視為神聖。對他們而言，統治者與官吏在神的面前皆是同樣的「罪人」，國家與官職只是因需要才設立的事務性機構與位置，沒有咒術的意味，亦無超人的權威。人們對它不必有恭順之念，但卻必須積極的參與和關注。這種公民權力的行使，加上努力工作、公共責任及職業投注等清教倫理，為歐洲新興中產階級所接受，並且成為反傳統經濟與政治行為的動力。這些都是中產階級生活中最令人欽羨的特徵。韋伯稱讚這些行為是「市民資產階級從前很少甚至沒有表現過的英雄行徑。正如卡萊爾(Carlyle)所說，視它為『我們所有英雄主義中的最後一項』也不為過」^⑩。

的確，韋伯曾對中產階級寄予厚望，認為這是恢復政治教育實踐的適當起點。在一八九四年支助諾曼(Naumann)創刊《援助》(Die Hilfe)期間，他便經常和刊物有關的教士、老師、文官、工匠及少數工人保持聯繫。他們企圖組織一個小黨，希望在中產階級裡傳佈社會責任感，藉以創造國家的統一，並訓練勞工具有民族主義。但稍後韋伯就和這個團體疏遠了，雖然他支持民族主義，不過個人自由也是他所堅信的。對他來說，民族主義與個人主義並非不

能相容，反而能夠活用個人主義的民族主義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。他不覺得德國民族主義應有的形態和西歐有本質上的差異，也不認為這是德國本有的東西，而主張應用近代歐洲本來的生活方式去把握它才對^⑩。

立基於上述的理由，韋伯對當時德國中產階級的表現感到失望並提出批評。和其他層級的人們一樣，當時德國的中產階級也對俾斯麥耀眼的成就賦予盲從的喝采。韋伯認為這種現象只是他們失敗的部份原因。其實，他們之所以被壓抑和輕蔑的主要原因，大都是他們慣常的默從多於參與的時候。本質上，這和長期以來的政治冷漠(apolitical)傳統相互關聯。至十八世紀時，這種現象可以說是已經發展到極致了。在這段期間，德國的中產階級及國民已經證實了文化及哲學的價值，但德國文人的古典智慧在政治上卻少有貢獻。雖然德國精神在文化及哲學的範疇裡得到最高度的發揮，不過卻被排除在政治的領域之外。

造成上述德國中產階級政治冷漠的原因良多。從歷史比較的角度觀察，它可以歸納為下述兩項：(1)因工業化腳步遲緩與政治集中化的結果，德國中產階級的發展較西歐其他國家來得遲，同時數量上也較少。作為一股政治力量而言，他們當時的狀況是很難令人有所指望的。(3)喀爾文主義的價值在德國的影響比英美來得少。當作政治教育的資源，清教倫理對於英美的民主政治具有持續性的影響。反之，在德國則是路德主義的天下，他們緊緊地維護著蘊含政治冷漠偏差的權威^⑪。

根據韋伯的觀察，儘管有上述兩項因素，但欲瞭解這

個現象的最重要線索應該是：「某一偉人的統治這件事，絕非政治教育的手段」¹³。這意味著俾斯麥所帶來的後果，不僅是促使德國成為強權以便活躍於世界舞臺上，同時也產生了權力政治的教訓。韋伯痛心他指出：「這種型態的俾斯麥文學，藉由隱蔽他的缺點並誹謗他的對手，一味地迎合英雄主義的心態並甘為其奴役。但是應用這種方式，我們無法教育民衆，讓他們發展獨立政治思考的習慣。這種作法無法消滅俾斯麥的巨人形象，以便公平地對待他的對手，同時也不能無掩飾地指出他厭惡人類的後果；甚至沒有指出這個事實，亦即至一八七八年以來，國民一直無法透過所選舉出的代表，去共享政治事務的決定。但是，此種參與卻是發展政治判斷能力的前題條件」¹⁴。由此可見，相對於獨裁君主及其底下的龐大科層體系，當時德國人民的政治表現是相當不成熟的，這可說是俾斯麥所帶來的另一項遺產——政治教育的缺乏。

除了上述遺產外，「悲劇性的，俾斯麥重複了他的收獲；因為他一直期望並且已經完成了議會及政黨領袖的政治無能」¹⁵。避免任何壯大及獨立政黨的強化是其國內政策的首要目標。為了達到這個目標，「他最基本的手段就是軍事預算及反社會主義者法案(the anti-socialist legislation) [一八七八——一八九〇]；此外，他相當技巧地操縱著在關稅政策上的衝突」¹⁶。

在呈送軍事預算案給議會時，俾斯麥刻意提出「帝國軍隊對抗議會軍隊」的口號。其目的在於製造議會的衝突，從中打擊反對者以壯大自己的勢力。在這個具煽動性

的口號下，軍事問題的討論被分裂成兩派。一派主張爲了國家的穩定與強大，軍事預算必須維持七年一審的原案。另一派則認爲，爲了議會的權益，這個問題應由議會全權議決。基本上，他們覺得七年的年限過長應予以降低。在兩派尖峰對立的當兒，俾斯麥便成功地把這問題由技術的層次提昇至意識的層次。凡是主張降低年限的攻黨，不是被控以「攻擊帝王權威」的罪行，就是被污爲「敵視皇軍」的罪狀。藉此，俾斯麥不但直接排除了異己，同時也間接提昇了自己的地位^①。

此外，善用政黨間的利益衝突與妥協也是俾氏排除異己的殺手鐮。俾斯麥的政權立基於保守黨(conservative party)底下的普魯士特權貴族(Junker)，他們是東部半封建農業結構的一群大地主。爲了所生產農作物的利潤，他們冀望有關稅保護政策來杜絕穀物的進口。這個願望在一九〇二反對美蘇穀物進口的保護關稅法案中得到實現，不過這是因國家自由黨員(National Liberals)的支持所促成的。國家自由黨係由西部的工業家所組成，認爲工業資本主義的擴張是現代經濟的基礎。他們怎麼會支持關稅保護政策呢？國家自由黨員是帝國主義者(imperialists)，泛德主義者(Pan-Germanists)，同時也是反英份子(Anglophobes)；在傲氣受到折傷之餘，他們希望向英國人表示：德國人也能建造輪船^②。爲了海軍方案能夠得到保守黨的支持，以便成爲國家的政策，他們妥協了。因爲這不但能夠彌補受創的折傷，同時也是難得的利益所在。

然而，根據韋伯的看法，西部工業主義與東部農業主

義間的妥協卻帶來德國內政及外交上的敗筆。工業家們與普魯士特權貴族間的結合，不純粹是經濟利益的關係。除此之外，他們都懼怕代表勞工階級的社會民主黨(Social Democrats)崛起；因為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黨迫切地要求民主，同時對普魯士的三階級參政系統大肆攻擊。是故這個政黨的崛起必然遭到前兩個政黨的夾擊和壓抑。於是「戒嚴法」(emergency law)及「反社會主義者法案」相繼誕生。

在戒嚴法的掩護之下，俾斯麥從不嘗試去協調他和議會間的嫌隙，便擅自將議會加以解散。同時他找到一個良好的機會，可以讓他放膽地去摧毀當時唯一最具勢力的政黨——社會民主黨¹⁹。於是議會與政黨在他的魔掌與科層工具底下，格外顯得藐小和無力。因此，在批評戒嚴法所造成的不良後果時，韋伯指出：「……在這個例子裡所完成的事情是，讓所有的人都戴上口罩，而不是將某些人綁上鍊子。總之，基本的錯誤係源自俾斯麥帝政主義的瘋狂表現，將平等權利的真義完全抹殺，亦即權利的普遍廢除」²⁰。

在反社會主義者法案的支持下，俾斯麥拒斥了所有保護勞工的立法，並且任令警察去摧毀代表勞工利益的貿易聯盟(trade unions)²¹。其結果非但是國民身心健康的忽略，更嚴重的是，它將會造成社會心理與人格的扭曲。韋伯評論道：「正如在文化鬥爭裡，在此俾斯麥藐視了所有重要的心理學的考慮。尤其是，在處理貿易聯盟時有一點被忽略了，甚至到今天還有某些政客尙不能體會：一個希望把她的國民軍的精神建立在榮譽與團結的國家，絕對不能忘

記在日常生活及勞工的經濟奮鬥中，榮譽與團結的情操是作為大眾教育之唯一決定性的道德力量，也因為如此，這些情操必須給予自由如意的掌握或統御。沒有別的，這正是『社會民主』的政治意義，它不可避免地保存在資本主義者的時代裡^⑳。」

在檢視俾斯麥的豐富遺產時，韋伯最感興趣的是什麼？他的興趣不但散發出他對當時德國政治的熱情關懷，同時也顯露出他冷靜的判斷力與社會責任感。最值得注意的是俾斯麥遺產必須到韋伯的政治危機意識深處裡找尋：「他所留下的正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教育的國家。……一個沒有任何自己政治意志的國家，……在那裡議會只不過是統治科層組織之非得忍受的橡皮圖章^㉑。」不僅是議會的無能，公民的無能也同樣形成了後代所不能苟同或無法欽慕的政治環境。總而言之，韋伯所繼承的俾斯麥遺產是一筆無以數計的負債：政治教育與政治成熟的危機。而他所能做的最後一項英雄行為，即是將這筆債的償還當作一種天職：政治教育與政治成熟的呼籲。

政治教育與政治成熟

根據韋伯自己說，佛萊堡大學的就職演講，係從個人主觀的立場出發，透過政策的評價以判斷民族經濟現狀，並闡明其根據。但由上述的分析可知，這次演說的範圍不止於經濟政策，而是擴及一般政治。因此，這篇演講可說是他的政治信仰的告白。如果從韋氏的關懷焦點來看，它

不但是民族主義的宣言，也是對貴族特權階級及官僚的挑戰書，更是對俾斯麥遺產的宣戰佈告。他認為政治問題考慮的出發點，應該是對民族將來世代的命運負責。一切政策的目標並不是針對子孫的幸福，而是將我們高尚的氣質或所企求的德性育成後代的品性，讓他們能為民族的存在與進步做持久的奮鬥。但是，誰才有資格負起「我們在歷史之前的責任」(our responsibility before history)呢？

如上文所提及，新興中產階級的表現令心存厚望的韋伯感到氣餒。因為在俾斯麥所製造的政治秩序底下，他們雖然已經取得經濟上的勢力，但卻缺乏共享政治權力與經驗的意願。那麼，新工業普羅階級是否有能力取而代之呢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，因為可以想像的是，由這些不具創意只一味追隨與模倣的亞流(epigones)掌握政權，勢必帶來國家民族的厄運²⁴。針對中產階級而言，我們所質疑的唯一問題，係他們是否已經冷漠太久了，以致無法獲得政治的經驗與成熟。但就無產階級而言，我們尚須擔心，這群訴諸群眾運動的勞工，是否能產生一個擁有政治天才的「貴族政體」(aristocracy)。韋伯對當時德國的勞工組織抱持相當悲觀的態度，因為它的型態表現出十足自滿與狂妄的性格。就以社會民主黨而言，這種性格充分表現在領導群對馬克思主義的狂熱，以及採取妖言惑眾的方式參與政治活動。即使他們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之後，其所帶來的結果將不會是政治的民主化，反而是科層體制的再度擴張與極權統治²⁵。反觀其他國家的勞工運動，特別是英國，他們已經脫離這種不成熟的政治參與方式，代之以發